



▲阳谷县东张遗址出土行炉
▲阳谷县东张遗址出土陶瓷器

被宋代黄河「逼退」的古村落

□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

东张遗址位于阳谷县大布乡东张村东北,地处东汉以来黄河故道东岸,面积约1.2万平方米,属于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郓州一处基层农村聚落。遗址处于地下2米处,西临古黄河,与现在的聊城市城区和莘县隔河相望。这处“2024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有何独特之处呢?

整个村子居址近乎完整

2020年12月,菏泽市曹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东阳高速考古调查勘探时发现了东张遗址。2023年8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工程占压遗址进行了复勘。2024年5月至11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配合性考古发掘,实际揭露面积达2800平方米以上,共发现围垄、围沟、房屋、道路、柱洞、灶、灰坑、灰沟等116个遗迹单位,出土了瓷、陶、骨、铁、铜等材质的生产、生活遗物。

根据地层堆积、出土器物,特别是遗址兴废的上下地层,专家确认东张遗址在后晋开运元年(944年)黄河滑州决口后开始建设,废弃在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北流横陇故道之前。

从现场考古来判断,这处古村落分三期进行建设,面积逐步扩大。比较有意思的是,三个区域分别建有高约0.6米的围垄,除较早的一区围垄分两期,二区、三区皆为外侧取土一次性堆筑而成,显然是经过规划统一施工而成。这种以围垄为边界,居住区分区规划的发展形态,在以往考古中是比较少见的。

古村落内,多为三面为土墙、房门所在为篱笆墙、两两相对的排房排列形式,还发现了长33米、宽5米的长屋,以及两屋一灶房的组合。这反映出村子内可能存在特殊功能区,从中还能看到集体生活、小家庭生活的不同居住形态。在室内,几乎每个家庭都发现了砖灶,灶中有黑灰,但没有发现土炕。“一种猜测是当时天气比较暖和,人们用席子铺在地上或者床上睡。”项目负责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吴志刚表示。

在一区房屋和三区房屋周边发现的行炉是本次出土器物的亮点,它们器型古朴,分陶、瓷两类。行炉是行香礼佛之用,反映了该聚落居民的精神生活和宗教信仰,为研究古代宗教仪式、信仰习俗等提供了线索。另外,本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陶、瓷器具有明显的商品化特征,同时出土有大量的牛骨,这些在周边同时期考古发掘中尚属少见,说明这个村子可能经济业态比较独特。

现场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个古村落里,每家都有墙、有院、有屋、有灶、有灰坑,还有众多用于立木柱的土坑,以及立门板所用的砖础,但是唯独没有发现坑式厕所。“针对这个问题,考古队进行了讨论。我们猜测,当时村民可能使用马桶解决如厕问题,同时粪便可能用于农业种植,因此没有留下相关痕迹。”吴志刚解释。

“本次考古发掘近乎完整地揭露了该聚落的居址部分,在社会形态研究上提供了基层聚落从初始的集体生活到稳定后小家庭结构转变的考古资料,其围垄分区与后世明堆高台建筑差异显著,为黄河滩区聚落营建提供了新范式。”吴志刚表示。

从现场看,这个村子后来因水患而整体搬迁。由于遗址是搬迁后留下的,而不是洪水直接淹没村庄所致,所以人们把能用的东西基本上都搬走了。比如,木门、房梁、立柱,以及能重复使用的碗、盆等,都被带走,仅留下少量砖块和破碎无法使用的陶盆、瓷碗等。

陈平原、夏晓虹夫妇



陈平原、夏晓虹夫妇

小泽观堂

我买的第一本书,是小画册《竹蜂战》,讲的是越南少儿抗击美军的故事。那年我七岁。母亲领我去赶集买大集,卖了香椿给我买的,九分钱。这本小画册放在书包里,一直珍藏到小学毕业。对书的感觉啊,真的就是“爱不释手”。

后来上了初中,买了《祖冲之与圆周率》《格点和面积》《数学万花筒》等数学书(我一度特别喜欢数学,想当个数学家),后来喜欢上了文学。等参加了工作,买的多是文学书,以小说居多。先有了书籍,才有了书房。书也渐渐多起来,书房满了,就摆在客厅里,有的放到了地下室。虽然看得不多,却依然见了书就想买。直到某日惊觉:书架上的尘埃,都能写字了。

我现在对书的态度,是又爱又恨。扔了舍不得,有时说不定哪本书还用得着呢。不扔吧,太占地方。于是,一本本书,依然来到家里,越积越多。我想起了一句话,“占有就是被占有。”你占有了书,也就被书所占有。

近日,看到了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夏晓虹夫妇将毕生藏书捐赠首都图书馆的消息。这两位学者的选择,不仅是完成三万册书籍的物质迁徙,更开启了一场学术精神的接力。在功利主义浸染学术界的当下,这份对纯粹治学理想的坚守,对书的钟爱,让人敬佩。

这对学生伉俪的藏书史,恰是一部鲜活

的学术生命史。夏晓虹为编纂《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踏遍大江南北搜集史料;陈平原为研究章太炎,在拍卖会上与《国故论衡》初版结缘。那些泛黄书页间的手泽批注,暗藏着学术发现的密码,连缀成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基因图谱。面对人工智能,陈平原说:“纸质书未来将是典藏的、审美的,而知识传递可交给电子书。”他们以行动诠释:“书比人长寿,短暂拥有已是福分。”在短视频泛滥、知识碎片化的今天,这对学者伉俪的抉择犹如一剂清醒剂:放弃占有,让书流动起来。

我读过陈平原和夏晓虹两位老师的书。2013年,我到北大进修,还选修过陈平原教授的课,他涉猎的现代文学领域,我特别感兴趣。我还利用课余时间写过一个陈平原先生谈版本问题的专访,话题当然谈的都是书。我对名人书房好奇,很想去看,但不好意思开口。

陈平原先生这次呼吁年轻人勿忘纸质阅读的独特魅力,同时强调人文学者需直面AI挑

战,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而非止步于知识灌输。这是老学者的期许,但也许将来,就跟我们不再翻阅竹简一样,将书真的都放进了博物馆里,不再翻看。

名人的藏书往往包含批注、手稿等个人研究痕迹,捐赠保存了学术思考的“活历史”,为后人研究提供线索,形成跨代际的学术对话。藏书的选择与积累往往反映学者治学路径,捐赠使其私人学术史成为公共历史的一部分,为学科史研究提供鲜活个案。私人藏书转化为公共资源,避免了文献散佚的风险,强化了社会对文化遗产的集体保护意识。两位学者的选择提示我们:知识的价值不仅在于占有,更在于流动;文化的生命力不仅依赖创造,也需依靠无私的传递。这种精神对于当下构建学习型社会、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我暂时还没有把书全部捐出去的想法,当然,我的书没有珍贵版本,价值不大,不值得捐给图书馆。再说,咱又不是什么名人。我想把自己的藏书捐给老家的社区、乡村,以微薄之力推动知识流动。老家要是不喜欢,我就卖废品,卖了换酒喝。

了搬迁。

与东张遗址同属郓州的东阿县城址,在北宋有三次迁移,也都是为了避开河患。东阿县城从春秋时期一直就在今阳谷县阿城镇,开宝二年(969年),黄河河水为患,东阿城址迁移到了南谷镇。开宝四年(971年),黄河及汶水、清河一并决溢,大水注入东阿城,毁坏了仓库和大批民舍。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东阿城又被河水淹没,不得不再次迁址,移到了利仁镇。绍圣三年(1096年),东阿城遭遇大水,又被迫迁往新桥镇。

郓州阳谷县城址在北宋也发生过两次迁移。开宝六年(973年)河水冲破阳谷县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移县城到上巡镇。迁址以后,黄河在县北十二里。景德三年(1006年),阳谷县城又疑因水患而迁往孟店。

城防完备的县城尚且不能抵御黄河水患,位于黄河故道滩区的普通村落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吴志刚看来,东张遗址的时代,能确定为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为黄泛区的遗址断代提供了标尺,为研究黄河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聚落适应性提供了实证,是河济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兴废与后晋和北宋早期的洪水事件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关于黄河泛滥的记载,对研究黄河泛滥史、沿黄地区的聚落发展、黄河堤防的修建等具有重要价值。

“东张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的村落布局、社会生产面貌、社会结构、普通民居建筑、精神信仰及河流变迁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其发掘不仅填补了鲁西地区该时期农村基层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同时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吴志刚表示。

当时因河患搬迁很普遍

了搬迁。

与东张遗址同属郓州的东阿县城址,在北宋有三次迁移,也都是为了避开河患。东阿县城从春秋时期一直就在今阳谷县阿城镇,开宝二年(969年),黄河河水为患,东阿城址迁移到了南谷镇。开宝四年(971年),黄河及汶水、清河一并决溢,大水注入东阿城,毁坏了仓库和大批民舍。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东阿城又被河水淹没,不得不再次迁址,移到了利仁镇。绍圣三年(1096年),东阿城遭遇大水,又被迫迁往新桥镇。

郓州阳谷县城址在北宋也发生过两次迁移。开宝六年(973年)河水冲破阳谷县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移县城到上巡镇。迁址以后,黄河在县北十二里。景德三年(1006年),阳谷县城又疑因水患而迁往孟店。

城防完备的县城尚且不能抵御黄河水患,位于黄河故道滩区的普通村落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吴志刚看来,东张遗址的时代,能确定为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为黄泛区的遗址断代提供了标尺,为研究黄河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聚落适应性提供了实证,是河济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兴废与后晋和北宋早期的洪水事件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关于黄河泛滥的记载,对研究黄河泛滥史、沿黄地区的聚落发展、黄河堤防的修建等具有重要价值。

“东张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的村落布局、社会生产面貌、社会结构、普通民居建筑、精神信仰及河流变迁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其发掘不仅填补了鲁西地区该时期农村基层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同时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吴志刚表示。

当时因河患搬迁很普遍

了搬迁。

与东张遗址同属郓州的东阿县城址,在北宋有三次迁移,也都是为了避开河患。东阿县城从春秋时期一直就在今阳谷县阿城镇,开宝二年(969年),黄河河水为患,东阿城址迁移到了南谷镇。开宝四年(971年),黄河及汶水、清河一并决溢,大水注入东阿城,毁坏了仓库和大批民舍。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东阿城又被河水淹没,不得不再次迁址,移到了利仁镇。绍圣三年(1096年),东阿城遭遇大水,又被迫迁往新桥镇。

郓州阳谷县城址在北宋也发生过两次迁移。开宝六年(973年)河水冲破阳谷县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移县城到上巡镇。迁址以后,黄河在县北十二里。景德三年(1006年),阳谷县城又疑因水患而迁往孟店。

城防完备的县城尚且不能抵御黄河水患,位于黄河故道滩区的普通村落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吴志刚看来,东张遗址的时代,能确定为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为黄泛区的遗址断代提供了标尺,为研究黄河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聚落适应性提供了实证,是河济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兴废与后晋和北宋早期的洪水事件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关于黄河泛滥的记载,对研究黄河泛滥史、沿黄地区的聚落发展、黄河堤防的修建等具有重要价值。

“东张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的村落布局、社会生产面貌、社会结构、普通民居建筑、精神信仰及河流变迁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其发掘不仅填补了鲁西地区该时期农村基层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同时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吴志刚表示。

当时因河患搬迁很普遍

了搬迁。

与东张遗址同属郓州的东阿县城址,在北宋有三次迁移,也都是为了避开河患。东阿县城从春秋时期一直就在今阳谷县阿城镇,开宝二年(969年),黄河河水为患,东阿城址迁移到了南谷镇。开宝四年(971年),黄河及汶水、清河一并决溢,大水注入东阿城,毁坏了仓库和大批民舍。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东阿城又被河水淹没,不得不再次迁址,移到了利仁镇。绍圣三年(1096年),东阿城遭遇大水,又被迫迁往新桥镇。

郓州阳谷县城址在北宋也发生过两次迁移。开宝六年(973年)河水冲破阳谷县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移县城到上巡镇。迁址以后,黄河在县北十二里。景德三年(1006年),阳谷县城又疑因水患而迁往孟店。

城防完备的县城尚且不能抵御黄河水患,位于黄河故道滩区的普通村落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吴志刚看来,东张遗址的时代,能确定为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为黄泛区的遗址断代提供了标尺,为研究黄河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聚落适应性提供了实证,是河济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兴废与后晋和北宋早期的洪水事件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关于黄河泛滥的记载,对研究黄河泛滥史、沿黄地区的聚落发展、黄河堤防的修建等具有重要价值。

“东张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的村落布局、社会生产面貌、社会结构、普通民居建筑、精神信仰及河流变迁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其发掘不仅填补了鲁西地区该时期农村基层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同时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吴志刚表示。

当时因河患搬迁很普遍

了搬迁。

与东张遗址同属郓州的东阿县城址,在北宋有三次迁移,也都是为了避开河患。东阿县城从春秋时期一直就在今阳谷县阿城镇,开宝二年(969年),黄河河水为患,东阿城址迁移到了南谷镇。开宝四年(971年),黄河及汶水、清河一并决溢,大水注入东阿城,毁坏了仓库和大批民舍。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东阿城又被河水淹没,不得不再次迁址,移到了利仁镇。绍圣三年(1096年),东阿城遭遇大水,又被迫迁往新桥镇。

郓州阳谷县城址在北宋也发生过两次迁移。开宝六年(973年)河水冲破阳谷县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移县城到上巡镇。迁址以后,黄河在县北十二里。景德三年(1006年),阳谷县城又疑因水患而迁往孟店。

城防完备的县城尚且不能抵御黄河水患,位于黄河故道滩区的普通村落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吴志刚看来,东张遗址的时代,能确定为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为黄泛区的遗址断代提供了标尺,为研究黄河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聚落适应性提供了实证,是河济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兴废与后晋和北宋早期的洪水事件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关于黄河泛滥的记载,对研究黄河泛滥史、沿黄地区的聚落发展、黄河堤防的修建等具有重要价值。

“东张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的村落布局、社会生产面貌、社会结构、普通民居建筑、精神信仰及河流变迁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其发掘不仅填补了鲁西地区该时期农村基层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同时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吴志刚表示。

当时因河患搬迁很普遍

了搬迁。

与东张遗址同属郓州的东阿县城址,在北宋有三次迁移,也都是为了避开河患。东阿县城从春秋时期一直就在今阳谷县阿城镇,开宝二年(969年),黄河河水为患,东阿城址迁移到了南谷镇。开宝四年(971年),黄河及汶水、清河一并决溢,大水注入东阿城,毁坏了仓库和大批民舍。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东阿城又被河水淹没,不得不再次迁址,移到了利仁镇。绍圣三年(1096年),东阿城遭遇大水,又被迫迁往新桥镇。

郓州阳谷县城址在北宋也发生过两次迁移。开宝六年(973年)河水冲破阳谷县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移县城到上巡镇。迁址以后,黄河在县北十二里。景德三年(1006年),阳谷县城又疑因水患而迁往孟店。

城防完备的县城尚且不能抵御黄河水患,位于黄河故道滩区的普通村落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吴志刚看来,东张遗址的时代,能确定为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为黄泛区的遗址断代提供了标尺,为研究黄河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聚落适应性提供了实证,是河济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兴废与后晋和北宋早期的洪水事件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关于黄河泛滥的记载,对研究黄河泛滥史、沿黄地区的聚落发展、黄河堤防的修建等具有重要价值。

“东张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的村落布局、社会生产面貌、社会结构、普通民居建筑、精神信仰及河流变迁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其发掘不仅填补了鲁西地区该时期农村基层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同时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吴志刚表示。

当时因河患搬迁很普遍

了搬迁。

与东张遗址同属郓州的东阿县城址,在北宋有三次迁移,也都是为了避开河患。东阿县城从春秋时期一直就在今阳谷县阿城镇,开宝二年(969年),黄河河水为患,东阿城址迁移到了南谷镇。开宝四年(971年),黄河及汶水、清河一并决溢,大水注入东阿城,毁坏了仓库和大批民舍。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东阿城又被河水淹没,不得不再次迁址,移到了利仁镇。绍圣三年(1096年),东阿城遭遇大水,又被迫迁往新桥镇。

郓州阳谷县城址在北宋也发生过两次迁移。开宝六年(973年)河水冲破阳谷县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移县城到上巡镇。迁址以后,黄河在县北十二里。景德三年(1006年),阳谷县城又疑因水患而迁往孟店。

城防完备的县城尚且不能抵御黄河水患,位于黄河故道滩区的普通村落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吴志刚看来,东张遗址的时代,能确定为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为黄泛区的遗址断代提供了标尺,为研究黄河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聚落适应性提供了实证,是河济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兴废与后晋和北宋早期的洪水事件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关于黄河泛滥的记载,对研究黄河泛滥史、沿黄地区的聚落发展、黄河堤防的修建等具有重要价值。

“东张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的村落布局、社会生产面貌、社会结构、普通民居建筑、精神信仰及河流变迁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其发掘不仅填补了鲁西地区该时期农村基层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同时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吴志刚表示。

当时因河患搬迁很普遍

了搬迁。

与东张遗址同属郓州的东阿县城址,在北宋有三次迁移,也都是为了避开河患。东阿县城从春秋时期一直就在今阳谷县阿城镇,开宝二年(969年),黄河河水为患,东阿城址迁移到了南谷镇。开宝四年(971年),黄河及汶水、清河一并决溢,大水注入东阿城,毁坏了仓库和大批民舍。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东阿城又被河水淹没,不得不再次迁址,移到了利仁镇。绍圣三年(1096年),东阿城遭遇大水,又被迫迁往新桥镇。

郓州阳谷县城址在北宋也发生过两次迁移。开宝六年(973年)河水冲破阳谷县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移县城到上巡镇。迁址以后,黄河在县北十二里。景德三年(1006年),阳谷县城又疑因水患而迁往孟店。

城防完备的县城尚且不能抵御黄河水患,位于黄河故道滩区的普通村落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吴志刚看来,东张遗址的时代,能确定为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为黄泛区的遗址断代提供了标尺,为研究黄河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聚落适应性提供了实证,是河济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兴废与后晋和北宋早期的洪水事件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关于黄河泛滥的记载,对研究黄河泛滥史、沿黄地区的聚落发展、黄河堤防的修建等具有重要价值。

“东张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的村落布局、社会生产面貌、社会结构、普通民居建筑、精神信仰及河流变迁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其发掘不仅填补了鲁西地区该时期农村基层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同时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吴志刚表示。

当时因河患搬迁很普遍

了搬迁。

与东张遗址同属郓州的东阿县城址,在北宋有三次迁移,也都是为了避开河患。东阿县城从春秋时期一直就在今阳谷县阿城镇,开宝二年(969年),黄河河水为患,东阿城址迁移到了南谷镇。开宝四年(971年),黄河及汶水、清河一并决溢,大水注入东阿城,毁坏了仓库和大批民舍。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东阿城又被河水淹没,不得不再次迁址,移到了利仁镇。绍圣三年(1096年),东阿城遭遇大水,又被迫迁往新桥镇。

郓州阳谷县城址在北宋也发生过两次迁移。开宝六年(973年)河水冲破阳谷县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移县城到上巡镇。迁址以后,黄河在县北十二里。景德三年(1006年),阳谷县城又疑因水患而迁往孟店。

城防完备的县城尚且不能抵御黄河水患,位于黄河故道滩区的普通村落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吴志刚看来,东张遗址的时代,能确定为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为黄泛区的遗址断代提供了标尺,为研究黄河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聚落适应性提供了实证,是河济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兴废与后晋和北宋早期的洪水事件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关于黄河泛滥的记载,对研究黄河泛滥史、沿黄地区的聚落发展、黄河堤防的修建等具有重要价值。

“东张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的村落布局、社会生产面貌、社会结构、普通民居建筑、精神信仰及河流变迁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其发掘不仅填补了鲁西地区该时期农村基层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同时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吴志刚表示。

当时因河患搬迁很普遍

了搬迁。

与东张遗址同属郓州的东阿县城址,在北宋有三次迁移,也都是为了避开河患。东阿县城从春秋时期一直就在今阳谷县阿城镇,开宝二年(969年),黄河河水为患,东阿城址迁移到了南谷镇。开宝四年(971年),黄河及汶水、清河一并决溢,大水注入东阿城,毁坏了仓库和大批民舍。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东阿城又被河水淹没,不得不再次迁址,移到了利仁镇。绍圣三年(1096年),东阿城遭遇大水,又被迫迁往新桥镇。

郓州阳谷县城址在北宋也发生过两次迁移。开宝六年(973年)河水冲破阳谷县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移县城到上巡镇。迁址以后,黄河在县北十二里。景德三年(1006年),阳谷县城又疑因水患而迁往孟店。

城防完备的县城尚且不能抵御黄河水患,位于黄河故道滩区的普通村落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吴志刚看来,东张遗址的时代,能确定为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为黄泛区的遗址断代提供了标尺,为研究黄河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聚落适应性提供了实证,是河济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兴废与后晋和北宋早期的洪水事件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关于黄河泛滥的记载,对研究黄河泛滥史、沿黄地区的聚落发展、黄河堤防的修建等具有重要价值。

“东张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的村落布局、社会生产面貌、社会结构、普通民居建筑、精神信仰及河流变迁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其发掘不仅填补了鲁西地区该时期农村基层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同时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吴志刚表示。

当时因河患搬迁很普遍

了搬迁。

与东张遗址同属郓州的东阿县城址,在北宋有三次迁移,也都是为了避开河患。东阿县城从春秋时期一直就在今阳谷县阿城镇,开宝二年(969年),黄河河水为患,东阿城址迁移到了南谷镇。开宝四年(971年),黄河及汶水、清河一并决溢,大水注入东阿城,毁坏了仓库和大批民舍。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东阿城又被河水淹没,不得不再次迁址,移到了利仁镇。绍圣三年(1096年),东阿城遭遇大水,又被迫迁往新桥镇。

郓州阳谷县城址在北宋也发生过两次迁移。开宝六年(973年)河水冲破阳谷县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移县城到上巡镇。迁址以后,黄河在县北十二里。景德三年(1006年),阳谷县城又疑因水患而迁往孟店。

城防完备的县城尚且不能抵御黄河水患,位于黄河故道滩区的普通村落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吴志刚看来,东张遗址的时代,能确定为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为黄泛区的遗址断代提供了标尺,为研究黄河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聚落适应性提供了实证,是河济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兴废与后晋和北宋早期的洪水事件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关于黄河泛滥的记载,对研究黄河泛滥史、沿黄地区的聚落发展、黄河堤防的修建等具有重要价值。

“东张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的村落布局、社会生产面貌、社会结构、普通民居建筑、精神信仰及河流变迁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其发掘不仅填补了鲁西地区该时期农村基层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同时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吴志刚表示。

当时因河患搬迁很普遍

了搬迁。

与东张遗址同属郓州的东阿县城址,在北宋有三次迁移,也都是为了避开河患。东阿县城从春秋时期一直就在今阳谷县阿城镇,开宝二年(969年),黄河河水为患,东阿城址迁移到了南谷镇。开宝四年(971年),黄河及汶水、清河一并决溢,大水注入东阿城,毁坏了仓库和大批民舍。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东阿城又被河水淹没,不得不再次迁址,移到了利仁镇。绍圣三年(1096年),东阿城遭遇大水,又被迫迁往新桥镇。

郓州阳谷县城址在北宋也发生过两次迁移。开宝六年(973年)河水冲破阳谷县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移县城到上巡镇。迁址以后,黄河在县北十二里。景德三年(1006年),阳谷县城又疑因水患而迁往孟店。

城防完备的县城尚且不能抵御黄河水患,位于黄河故道滩区的普通村落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吴志刚看来,东张遗址的时代,能确定为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为黄泛区的遗址断代提供了标尺,为研究黄河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聚落适应性提供了实证,是河济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兴废与后晋和北宋早期的洪水事件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关于黄河泛滥的记载,对研究黄河泛滥史、沿黄地区的聚落发展、黄河堤防的修建等具有重要价值。

“东张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的村落布局、社会生产面貌、社会结构、普通民居建筑、精神信仰及河流变迁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其发掘不仅填补了鲁西地区该时期农村基层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同时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吴志刚表示。

当时因河患搬迁很普遍

了搬迁。

与东张遗址同属郓州的东阿县城址,在北宋有三次迁移,也都是为了避开河患。东阿县城从春秋时期一直就在今阳谷县阿城镇,开宝二年(969年),黄河河水为患,东阿城址迁移到了南谷镇。开宝四年(971年),黄河及汶水、清河一并决溢,大水注入东阿城,毁坏了仓库和大批民舍。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东阿城又被河水淹没,不得不再次迁址,移到了利仁镇。绍圣三年(1096年),东阿城遭遇大水,又被迫迁往新桥镇。

郓州阳谷县城址在北宋也发生过两次迁移。开宝六年(973年)河水冲破阳谷县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移县城到上巡镇。迁址以后,黄河在县北十二里。景德三年(1006年),阳谷县城又疑因水患而迁往孟店。

城防完备的县城尚且不能抵御黄河水患,位于黄河故道滩区的普通村落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吴志刚看来,东张遗址的时代,能确定为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为黄泛区的遗址断代提供了标尺,为研究黄河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聚落适应性提供了实证,是河济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兴废与后晋和北宋早期的洪水事件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关于黄河泛滥的记载,对研究黄河泛滥史、沿黄地区的聚落发展、黄河堤防的修建等具有重要价值。

“东张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的村落布局、社会生产面貌、社会结构、普通民居建筑、精神信仰及河流变迁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其发掘不仅填补了鲁西地区该时期农村基层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同时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吴志刚表示。

当时因河患搬迁很普遍

了搬迁。

与东张遗址同属郓州的东阿县城址,在北宋有三次迁移,也都是为了避开河患。东阿县城从春秋时期一直就在今阳谷县阿城镇,开宝二年(969年),黄河河水为患,东阿城址迁移到了南谷镇。开宝四年(971年),黄河及汶水、清河一并决溢,大水注入东阿城,毁坏了仓库和大批民舍。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东阿城又被河水淹没,不得不再次迁址,移到了利仁镇。绍圣三年(1096年),东阿城遭遇大水,又被迫迁往新桥镇。

郓州阳谷县城址在北宋也发生过两次迁移。开宝六年(973年)河水冲破阳谷县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移县城到上巡镇。迁址以后,黄河在县北十二里。景德三年(1006年),阳谷县城又疑因水患而迁往孟店。

城防完备的县城尚且不能抵御黄河水患,位于黄河故道滩区的普通村落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吴志刚看来,东张遗址的时代,能确定为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为黄泛区的遗址断代提供了标尺,为研究黄河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聚落适应性提供了实证,是河济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兴废与后晋和北宋早期的洪水事件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关于黄河泛滥的记载,对研究黄河泛滥史、沿黄地区的聚落发展、黄河堤防的修建等具有重要价值。

“东张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的村落布局、社会生产面貌、社会结构、普通民居建筑、精神信仰及河流变迁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其发掘不仅填补了鲁西地区该时期农村基层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同时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吴志刚表示。

当时因河患搬迁很普遍

了搬迁。

与东张遗址同属郓州的东阿县城址,在北宋有三次迁移,也都是为了避开河患。东阿县城从春秋时期一直就在今阳谷县阿城镇,开宝二年(969年),黄河河水为患,东阿城址迁移到了南谷镇。开宝四年(971年),黄河及汶水、清河一并决溢,大水注入东阿城,毁坏了仓库和大批民舍。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东阿城又被河水淹没,不得不再次迁址,移到了利仁镇。绍圣三年(1096年),东阿城遭遇大水,又被迫迁往新桥镇。

郓州阳谷县城址在北宋也发生过两次迁移。开宝六年(973年)河水冲破阳谷县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移县城到上巡镇。迁址以后,黄河在县北十二里。景德三年(1006年),阳谷县城又疑因水患而迁往孟店。

城防完备的县城尚且不能抵御黄河水患,位于黄河故道滩区的普通村落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吴志刚看来,东张遗址的时代,能确定为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为黄泛区的遗址断代提供了标尺,为研究黄河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聚落适应性提供了实证,是河济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兴废与后晋和北宋早期的洪水事件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关于黄河泛滥的记载,对研究黄河泛滥史、沿黄地区的聚落发展、黄河堤防的修建等具有重要价值。

“东张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的村落布局、社会生产面貌、社会结构、普通民居建筑、精神信仰及河流变迁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其发掘不仅填补了鲁西地区该时期农村基层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同时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吴志刚表示。

当时因河患搬迁很普遍

了搬迁。

与东张遗址同属郓州的东阿县城址,在北宋有三次迁移,也都是为了避开河患。东阿县城从春秋时期一直就在今阳谷县阿城镇,开宝二年(969年),黄河河水为患,东阿城址迁移到了南谷镇。开宝四年(971年),黄河及汶水、清河一并决溢,大水注入东阿城,毁坏了仓库和大批民舍。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东阿城又被河水淹没,不得不再次迁址,移到了利仁镇。绍圣三年(1096年),东阿城遭遇大水,又被迫迁往新桥镇。